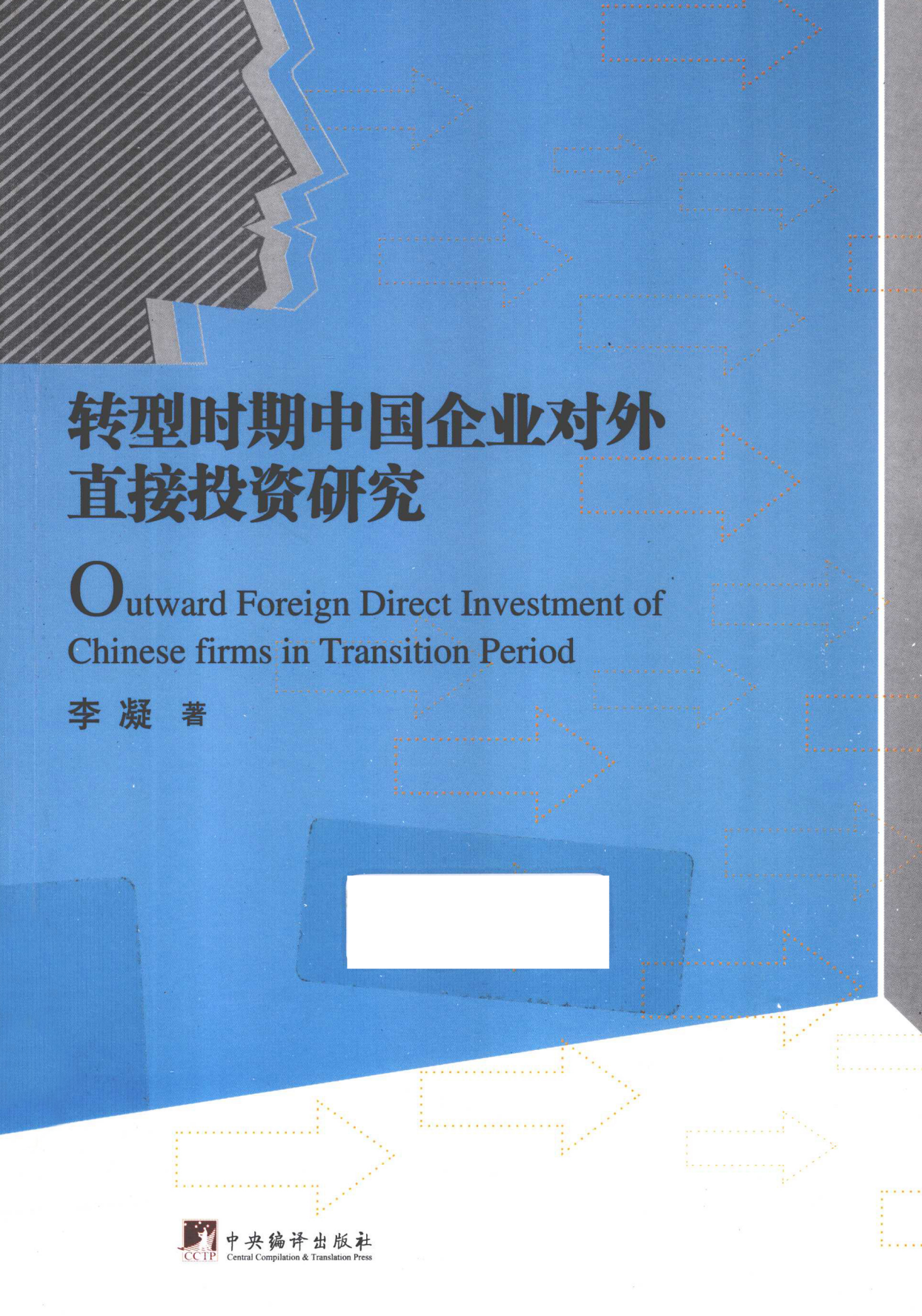




转型时期中国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研究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Chinese firms in Transition Period

李凝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转型时期中国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研究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Chinese firms in Transition Period

李 凝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时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 李凝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117-1339-1

I. ①转… II. ①李… III. ①企业—对外投资: 直接投资
—研究—中国 IV. ①F27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6288 号

转型时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出版人: 和 葵

责任编辑: 王曷灵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5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43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66509618

目 录

CONTENTS

内容简介.....	1
第一章 绪 论.....	1
1.1 研究的现实与理论背景	/ 1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7
1.2.1 问题的提出	/ 7
1.2.2 研究意义	/ 7
1.3 主要概念界定	/ 9
1.3.1 对外直接投资(OFDI)	/ 9
1.3.2 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转型经济国家	/ 10
1.4 本书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11
1.4.1 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内容	/ 11
1.4.2 研究方法	/ 14
1.4.3 篇章结构	/ 15
1.5 本研究的创新点	/ 18
第2章 文献述评	19
2.1 主流企业 OFDI 理论的适用性与解释力检视	/ 19
2.1.1 企业特定优势论	/ 20
2.1.2 OFDI“过程论”	/ 24

2.2 发展中国家企业 OFDI 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 25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26
2.2.2 技术地方化理论	/ 26
2.2.3 技术积累产业升级理论	/ 27
2.2.4 发展中国家企业 OFDI 理论评论小结	/ 28
2.3 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 29
2.3.1 非平衡理论	/ 30
2.3.2 跳板论	/ 31
2.3.3 关联—杠杆—学习理论(LLI 理论)	/ 31
2.4 基于资源基础观(RBV)的企业 OFDI 研究新发展	/ 33
2.5 制度理论、制度基础观(IBV)及其在新兴市场国家企业战略研究中的应用	/ 37
2.5.1 制度与制度理论	/ 37
2.5.2 企业战略的制度基础观(IBV)	/ 39
2.6 国内关于企业 OFDI 研究	/ 41
2.7 本研究的切入点及相应的理论视角	/ 42
 第3章 资源利用、资源探索与中国企业的 OFDI	45
3.1 RBV 视角下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的整合分析框架	/ 46
3.1.1 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的工具性价值	/ 46
3.1.2 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的整合分析框架	/ 47
3.1.3 对分析框架的进一步讨论	/ 51
3.2 制度与要素环境约束下中国企业的市场和非市场资源优劣势分析	/ 52
3.2.1 制度与要素环境对企业资源形成的影响	/ 52
3.2.2 中国企业的市场和非市场资源优势及其本土性分析	/ 53
3.2.3 中国企业的资源劣势分析	/ 57
3.3 资源优劣势驱动下中国企业 OFDI 动机与区位选择	/ 59
3.3.1 资源利用与中国企业 OFDI	/ 59
3.3.2 资源探索与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 66
3.4 资源利用与资源探索视角下中国企业 OFDI 进入模式分析	/ 69
3.4.1 企业 OFDI 进入模式选择的交易成本观点与 RBV 观点	/ 69

3.4.2 资源利用与资源探索视角下中国企业 OFDI 进入模式分析	/ 70
3.5 本章小结	/ 72
第4章 政策变迁、政府支持与中国企业的 OFDI	73
4.1 中国 OFDI 政策变迁的过程、特征及影响	/ 74
4.2 中国政府支持企业 OFDI 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75
4.3 政府支持与中国企业 OFDI 的制度性优势	/ 77
4.4 双重利益、政策倾斜与中国国有企业的 OFDI	/ 78
4.4.1 中国国有企业的双重角色和 OFDI 的双重动力	/ 80
4.4.2 政策倾斜与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	/ 83
4.5 国家所有权对国有企业 OFDI 战略选择的影响	/ 84
4.5.1 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净现值(NPV)模型的应用	/ 84
4.5.2 进入模式选择	/ 87
4.5.3 时机选择:Pindyck 简单双期模型的应用	/ 88
4.6 本章小结	/ 94
第5章 制度约束、制度规避、套利与中国企业的 OFDI	95
5.1 企业 OFDI 的制度规避与制度套利动机分析	/ 96
5.1.1 制度约束、战略反应与企业 OFDI 的制度规避动机	/ 96
5.1.2 比较制度优势与企业 OFDI 的制度套利动机	/ 99
5.2 制度约束下中国企业 OFDI 的制度规避与制度套利动机分析	/ 104
5.2.1 制度缺失	/ 105
5.2.2 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	/ 109
5.3 制度规避、制度套利与中国企业对避税地的直接投资	/ 113
5.3.1 海外上市	/ 114
5.3.2 知识产权保护	/ 117
5.4 本章小结	/ 119
第6章 制度压力、合宜性寻求与中国企业的 OFDI	120
6.1 制度压力与企业行为的合宜性驱动机制	/ 121
6.2 外部制度压力与中国企业的 OFDI	/ 123
6.2.1 政策性压力	/ 124

6.2.2 规范性压力	/ 125
6.2.3 模仿性压力	/ 127
6.3 内部制度压力与中国企业的 OFDI	/ 128
6.4 本章小结	/ 129
第7章 转型期中国 OFDI 特征解析	131
7.1 转型时期中国企业 OFDI 行为的资源——制度分析框架及推论	/ 132
7.2 中国 OFDI 的发展阶段	/ 133
7.3 中国 OFDI 地域分布特征	/ 138
7.3.1 中国 OFDI 存量高度集中于避税地	/ 138
7.3.2 中国 OFDI 地域分布格局偏离发展中国家常规	/ 140
7.3.3 OFDI 主要投资地中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偏多	/ 144
7.4 中国 OFDI 的时机分布	/ 146
7.5 本章小结	/ 148
第8章 中国企业 OFDI 现状的实证分析	149
8.1 研究设计	/ 150
8.1.1 样本选取标准	/ 150
8.1.2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 151
8.2 研究发现与研究结果	/ 153
8.2.1 样本企业 OFDI 动机	/ 153
8.2.2 OFDI 区位选择	/ 157
8.2.3 OFDI 进入模式	/ 160
8.3 本章小结	/ 162
第9章 构建二元型跨国公司的 OFDI 路径选择模式分析	163
9.1 中国企业 OFDI 路径选择的两种理论观点和模式	/ 164
9.1.1 先易后难模式	/ 164
9.1.2 先难后易模式	/ 165
9.1.3 已有模式的评价	/ 165
9.2 构建二元型跨国公司的“两线并行”模式的提出与理论分析	/ 166
9.2.1 “两线并行”模式的提出	/ 166

9.2.2 “两线并行”模式与双元型跨国公司的构建	/ 168
9.3 研究设计	/ 170
9.3.1 研究方法	/ 170
9.3.2 研究数据来源	/ 171
9.4 联想案例分析	/ 172
9.4.1 联想 OFDI 过程中的资源利用与资源探索及其平衡	/ 173
9.4.2 联想 OFDI 过程中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平衡	/ 177
9.5 联想案例总结	/ 180
9.6 结论与讨论	/ 181
第 10 章 结论与展望	182
10.1 主要研究结论	/ 182
10.1.1 转型期中国企业 OFDI 驱动力	/ 182
10.1.2 中国企业 OFDI 战略选择	/ 183
10.1.3 转型时期中国 OFDI 主体	/ 184
10.1.4 转型时期中国 OFDI 特征	/ 185
10.1.5 中国企业 OFDI 路径选择模式	/ 185
10.2 政策建议	/ 186
10.2.1 企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186
10.2.2 政府层面的政策建议	/ 188
参考文献	191

第 1 章

绪 论

本章首先介绍本研究的现实与理论背景,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拟研究的问题。在对本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后,对本书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作简要介绍,并说明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最后对本书预期的创新点进行展望。

1.1 研究的现实与理论背景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金砖四国(BRICs)、“展望五国”(Vista-5)、“新钻11国(Next-11)”等^①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力空前提高,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这些国家成为全球资本的重要输出国。虽然起步较晚,但增长迅速,无论规模还是增长率都在全球占据重要位置。在2008年和2009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受金融危机冲击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的OFDI虽也有所下滑但在全球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显著上升,2009年已经达到25%(UNCTAD, 2010)。伴随着OFDI的加速发展,新兴市场国家产生了一大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比如印度的塔塔集团、米塔尔公司;中国的联想、华为;巴西的淡水河谷、航空工业公司;墨西哥的西麦克斯等等。这些

^① 金砖四国(BRICs)是指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展望五国(VISTA-5)指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新钻十一国(Next-11)指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

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公司（简称新兴跨国公司，Emerging Multinationals）来自一些主流产业，而这些产业过去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主导。中国是新兴市场国家 OFDI 的领跑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我国 OFDI 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近几年来迅速扩张。2002~2009 年，中国 OFDI 年均增长速度高达 54.4%（商务部，2010）。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显示，2009 年中国 OFDI 流量达 480 亿美元，占当年全球流量的 5.1%，位居全球第 6 位，发展中国家（地区）首位。截至 2009 年底，中国 OFDI 存量约为 2300 亿美元，占全球存量的 1.3%（UNCTAD，2010）。

出于对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迅猛发展势头的重视，UNCTAD 出版的“2006 年世界投资报告”题目定为《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的影响》，其中特别指出：发展中国家的 OFDI 为其母国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也成为东道国吸收外来资本和知识的新来源之一。而在国际商务、战略管理等学术研究领域，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也正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自 2006 年起，国际商务学会（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的学术年会都对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OFDI）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包括《国际商务研究学报》（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在内的顶尖学术期刊都组织专刊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①。如何解释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 OFDI 行为，包括 OFDI 驱动力、区位选择、进入模式、路径选择等是学者们的主要研究主题。

主流 OFDI 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流派，即沿袭 Hymer（1976）垄断优势理论的“经济学派”和以 Johanson 和 Vahlne（1977，1990）为代表的瑞典“Uppsala 行为学派”。前者可以称作企业 OFDI 的“企业特定优势论”，后者则可称为企业 OFDI 的“过程论”。“企业特定优势论”的代表性理论是内部化理论（Internalization Theory；Buckley&Casson，1976）以及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Dunning，1980）。持“企业特定优势论”的学者认为，当企业拥有的优势足以弥补其因跨国运营所面临的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和额外成本时，

① 这些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研究专刊包括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7，2010；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Globalization，2008；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09；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0。

则具备 OFDI 的动机。“过程论”则强调企业在进行 OFDI 过程中,会遭遇到来自地理距离、心理距离以及文化和制度距离上的挑战 (Johanson&Vahlne, 1977, 1990; Autio, 2005), 因此企业的 OFDI 是一个渐进的经验学习过程: 在区位选择上遵循从距离更近的国家到距离更远的国家的发展路径; 在进入模式选择上遵循从资源承诺和投资风险较小的模式过渡到资源承诺和投资风险较大的模式的渐进原则。按照“企业特定优势论”的观点, 一国企业在没有建立起足够弥补外来者劣势的优势前, 不能从事 OFDI; 而根据“过程论”的观点, 从事 OFDI 的企业, 不可能首选地理和文化距离相对较远的国家或区位进行投资, 而只能是遵循由近及远的渐进式路径。“企业特定优势论”与“过程论”的研究对象都是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沿袭主流 OFDI 理论, Wells 和 Lall 先后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Wells, 1977) 和“技术地方化理论”(Lall, 1983) 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 OFDI, 学术界又称这两个理论为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理论, 其核心观点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适应发展中国家市场需要的独特竞争优势,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 OFDI 活动。

传统理论, 无论是“企业特定优势论”, 还是上述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理论, 暗含着“一国企业只有具备相对于他国企业的优势时才会进行 OFDI”这一基本命题, 而“过程论”则认为企业 OFDI 会遵循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 按照上述 OFDI 理论, 新兴市场国家的 OFDI 通常应该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那些与母国在地理距离、文化距离上接近的发展中国家, 采取逐步扩展的方式。关于传统理论对于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的解释力, 一些学者坚持“普适性”的观点, 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在 OFDI 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大到需要新理论来解释, 持这种思路的学者主要是 Dunning (2006) 和 Narula (2006) 等。当然, 这些学者也注意到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的独特性, 因此对传统 OFDI 理论进行了拓展。如 Dunning (1995) 将所有权优势的范围扩展至通过与其他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并在内部产生的能力和竞争力, 从而扩大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解释范围。而制度因素对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的重要影响促使 Dunning 等人在最近的研究中尝试将制度视角融入折衷理论中 (Dunning&Lundan, 2008)。但总体上看, 无论是坚持传统理论的解释力, 还是针对 OFDI 发展的新趋势对传统理论进行拓展, 持“普适性”观点的学者们倾向于认为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在一定的市场环境中已经开发出某些竞争优势, 并且它们可以将这些优势直接扩展

至国际市场。

然而，持“普适性”观点的学者们忽视了新兴市场国家 OFDI 特征的独特性。以中国为例，越是在早期，其 OFDI 越是集中于发达国家而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地理距离、文化距离以及经济距离上都与中国相距甚远的少数发达国家。2000 年以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开始增加，但主要投向了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地以及与中国在地理距离上非常遥远的非洲国家，与中国在地理距离、文化距离以及经济距离上接近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不是中国的主要投资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仍然是中国 OFDI 的热点。

传统理论对于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局限性随着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实践的发展也逐渐显现出来。首先，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存在明显的差异。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一般来源于高端专有技术或其他优势资源（如品牌及管理营销技能等），而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公司显然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中国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与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也有明显的不同。根据“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小规模制造”和“技术地方化”这两个方面，这两种理论对于中国民营企业 and 中小企业的 OFDI 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衣长军，2007），但对于中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 OFDI，这两种理论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包括中国跨国公司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公司同样具备竞争优势”这一观点已获得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具备何种竞争优势却是一个需要加以研究的课题。

其次，依据传统理论，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在技术、营销和管理技能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仍处于劣势，因此它们只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 OFDI，其 OFDI 活动也只能限于价值链的低端。但最近的发展趋势显示，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的 OFDI 大量增加，其价值链活动也延伸到更高的价值增值活动（Luo&Tung，2007），这与 20 世纪 70、80 年代发展中国家企业凭借在产品与生产流程技术方面的特殊优势，从而在与本国要素成本和需求特征相似的其他中东道国进行 OFDI 是不同的。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实践的发展无疑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许多学者认识到了主流 OFDI 理论的适用范围及其局限性，强调了新兴市场

国家企业 OFDI 的独特性,如在缺少竞争优势情况下积极在发达国家进行资产寻求型 OFDI 等,认为有必要超越主流理论来解释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新近出现的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理论为解释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该理论认为,作为全球竞争的后来者 (Late Comers),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在母国形成的所有权优势往往不足以形成相对于东道国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它们 OFDI 的动机除了优势利用 (Advantages Exploitation),还包括优势寻求 (Advantages Seeking) (Makino, Lau&Yeh, 2002)。Luo&Tung (2007) 提出的跳板理论 (Springboard View) 认为,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公司将 OFDI 作为跳板来获得战略资产 (Luo&Tung, 2007)。

相对于传统理论对企业 OFDI 优势利用动机的关注,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理论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对于谁来寻求、如何寻求、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寻求则分析比较粗略,似乎任何新兴市场国家企业都可以在寻求优势动机驱动下大规模地开展 OFDI 而不必考虑其自身条件。在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动机这一问题上,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理论似乎有些“矫枉过正”。有优势则利用优势,无优势则寻求优势。按照这一逻辑,似乎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该走入投资大国行列中了,而事实并非如此。当缺乏优势的时候,通过 OFDI 寻求优势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前提。因此这种简单的解释并未考虑到 OFDI 基础和动因的复杂性,特别是对于具有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转型制度环境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

无论是传统理论还是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理论都忽视了制度的影响。已有的大量关于企业 OFDI 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都是基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和背景,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否适用于解释其他制度背景或市场环境 (比如特定的转型经济环境) 下的企业 OFDI 行为却很少被验证。随着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发达国家企业与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 OFDI 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有必要对建立在发达国家企业 OFDI 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进行反思。对此制度理论的发展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制度理论认为制度环境是影响跨国公司行为的重要因素 (Scott, 2001; North, 1990)。在国际商务和战略管理领域,已经有学者提倡运用制度基础观 (Institution - Based View, IBV) 研究有关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问题,如 Peng 等 (2008) 和 Buckley 等 (2007)。IBV 的重要观点是企业的行为和绩效受其所处制度环境

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制度因素是认识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在 OFDI 过程中行为差异的一个关键 (Yamakawa et al., 2008; Morck et al., 2008)。然而对于制度因素如何影响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 OFDI 行为还没有得到系统研究。

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同时也作为全球经济中重要的新兴力量,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企业 OFDI 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一部分研究主要从主流 OFDI 理论及其拓展出发,分析中国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如 Erdener 和 Shapiro (2005) 在利用扩展的 OLI 理论解释中国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活动时认为,中国家族企业的竞争优势通常不是基于技术和专有知识,而是基于关系契约,这使得中国家族企业能比竞争对手更快地捕捉到商业机会。另外有些研究则针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理论创新,这方面国内学者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代表性的研究有:吴彬与黄韬(1997)提出的中国企业 OFDI 的二阶段理论、冼国明和杨锐(1998)提出学习型 OFDI 理论、孙建中(2000)针对中国大国特征的综合优势理论等。吴先明(2007)对中国企业战略资产寻求型国际化活动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围绕中国企业 OFDI 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基本问题,在探讨适合中国企业 OFDI 的理论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综合来看,笔者发现尽管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对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具有以下特点与局限性:(1)已有研究先后对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战略的优势利用和优势探索动机进行了分析,却忽视了它们 OFDI 战略意图的双重性,即其 OFDI 战略包含优势利用与优势探索这一双重战略动机;(2)已有研究忽视了制度的影响。尽管在国际商务和战略管理领域,已经有学者提倡并开始运用 IBV 研究有关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问题,但对于制度因素如何影响它们的 OFDI 行为还没有得到系统研究;(3)已有研究在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动机与区位选择、进入模式选择以及路径选择等战略选择之间缺乏一个整合的理论分析框架。正是从这一理论背景出发,本研究最终确定以中国企业 OFDI 为研究对象,分析其 OFDI 战略的驱动力与战略选择行为,目的是尝试推进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相关研究。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1.2.1 问题的提出

从实践背景来看,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尤其是中国企业的 OFDI 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这客观上要求理论研究的深入,当然也凸显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如前所述,已有研究关于新兴市场国家企业 OFDI 的解释先后提出了“优势利用型 OFDI”和“优势寻求型 OFDI”两大体系,两大理论体系针对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特定 OFDI 行为具有相应的解释力的同时也具有各自的局限性,而资源基础观(Resource - Based View, RBV)在整合已有两大理论体系上具有广阔的前景。另外,对处于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显著差异制度环境的中国企业来说,对其 OFDI 战略的研究还需要从制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因此,本书拟整合 RBV 和 IBV 研究转型时期中国企业 OFDI 行为,并探讨以下问题:(1)在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处于制度转型的环境下,中国企业具备哪些资源优劣势?资源优劣势对中国企业 OFDI 动机产生何种影响;(2)中国企业 OFDI 动机如何影响中国企业 OFDI 的战略选择,如区位选择、进入模式选择以及路径选择等;(3)转型时期的制度环境通过何种机制驱动中国企业的 OFDI,并对其战略选择行为产生影响;(4)基于 RBV 和 IBV 的理论分析结论能不能在中国企业 OFDI 宏观特征以及微观企业行为上得到体现。基于对这些重要理论问题的思考正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

1.2.2 研究意义

中国企业 OFDI 与其他国家企业,尤其是发达国家企业的 OFDI 相比,是在两个特殊条件下进行的。首先,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在国际竞争舞台上,中国企业属于后来者,一方面,它们缺乏发达国家企业具备的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也拥有全球化带来的追赶发达国家企业的机会。其次,中国企业处于一种过渡经济体制中,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变过程中,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同时,中国企业面临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由经营权扩大到产权;另一方面,大量外资涌入使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上面对国际竞争。因此,中国企业的 OFDI 有它不同的特征和路径选择。这样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企业 OFDI 很难去借鉴历史,也很难去套用现有理论。因此,中国企业因其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对其 OFDI 驱动力以及相应战略选择行为的研究具有情景嵌入(Context-Embedded)的特点^①,可以丰富相关研究领域的成果。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因其发展背景、增长速度、制度环境等方面的独特性,中国企业 OFDI 既可以检验既有理论,也为发展新理论提供了机会。

在实践意义上,本书对转型期中国企业 OFDI 战略动机和战略行为的分析有助于企业高层管理团队认识自身的战略态势和 OFDI 战略的重要地位,制定正确的战略选择。传统 OFDI 理论认为,企业 OFDI 是为了在国外市场利用其竞争优势。本书认为通过 OFDI 获取本国稀缺的,但国外相对丰裕的战略资产以及自然资源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赖以生存的传统低成本优势,正在成为全球性资源,为世界各国所共享。如何在全球性平台上整合各种资源,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是中国企业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培育有竞争力的企业,已成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成为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国企业必须思考如何“走出去”,“走向哪”,思考如何通过 OFDI 战略,融入全球价值链,获得更多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机会。本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企业决策提供参考。

本书研究还可以为政府制定耦合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 OFDI 政策提供依据。政府是 OFDI 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的建构主体,企业是 OFDI 的行为主体,政策引导、激励机制的建立应把二者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利益系统,这个系统应同时具备动态特征,使得政府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宏观战略目标下不断调整双方利益耦合点。通过企业的 OFDI,中国可以利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加强境外资源开发合作与综合利用,提高国家经济安

^① “情景嵌入”一词来源于徐淑英、刘忠明的《中国的企业管理研究:现状与未来》第 19 页(徐淑英,刘忠明,2004),主要指针对具体情景的研究方法以及对情景敏感的研究方法的本土化研究(Contextualized Indigenous Research)。

全、提高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并通过 OFDI 发展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外交关系。本书认为，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可以对以下三种类型的 OFDI 给予倾斜：第一类是以获取战略性自然资源为目的，能配合国家发展战略和长期利益的 OFDI；第二类是以寻求优势资产为目的的 OFDI；第三类是以利用中国企业相对优势、开拓国外市场、转移国内过剩产能而展开的 OFDI。上述三类投资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服务作为一种国家特定优势可以弥补中国企业竞争优势的不足，有助于形成中国企业的 OFDI 综合优势。

1.3 主要概念界定

1.3.1 对外直接投资 (OFDI)

OFDI 是以获得国外经营单位的所有权或控制权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投资，是企业投资决策的一个方面，也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一种形式。通常有三种情况：投资建立一家新的国外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投资收购国外一家现存企业的控制性股份；与国外经济主体共同投资建立合资企业。一家企业的最初对外投资标志该企业成为跨国企业。OFDI 与对外间接投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OFDI 是以获得经营控制权为条件的资本流动。第二，OFDI 是包含企业一揽子经营资源转移的资本流动。经营资源是指企业经营中发挥作用的各专有要素，主要包括专利、技术诀窍等生产性知识；经营管理的技能和知识；商标和市场营销技能等。这些经营资源一般难以在要素市场上进行交易。第三，OFDI 是经营资源由投资国特定部门的特定企业向受资国同一部门特定企业的转移，因此这种投资通常是企业利用某项经营机会时投资决策的附带结果，由于企业投资决策是一项长期性的决策，这种资本流动较少受目前金融市场状况的影响。第四，OFDI 并不一定是母国的货币资本流出，因为企业可以在东道国当地或国际金融市场筹资，也可以是设备、技术或其他无形资产的作价入股，在投资完成后还可以是国外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此外，对外投资与国内投资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外投资必须面对不熟悉的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环境。